

核心阅读

习近平主席指出：“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治，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贯彻这一重要思想，要从政治高度严肃对待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相关问题，在规划、研究、设计的起点就要强化其政治属性，确保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方向，确保我军能够打赢未来智能化条件下的政治军事仗。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物化形式，其军事应用的功能来自以往的军事思想、军事行动、武器使用等信息和数据，以及军事专家对这些信息和数据的量化分析，而上述因素都具有一定的阶级、国家或民族立场，因此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必然蕴含着政治倾向。如何站在政治高度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并为其塑造特定的政治属性，是军事领域建设面临的一项时代课题。

为什么要塑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应用，其优势日益凸显，由于大量使用无人化武器装备代替人类到一线作战后，减少了人的流血伤亡和由此带来的国民情绪巨大波动，

政治优势不可小觑。目前围绕智能化的世界军事竞争已拉开帷幕，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其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已越来越为世界所认知，特别是塑造其政治属性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这是人工智能的本质特点决定的。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由其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军事领域的各种人工智能系统，按照人类设定的程序逻辑或软件算法，通过芯片等硬件载体来运行或工作。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延伸，也是人类价值系统的延伸，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自然会在设计、应用等过程中被注入人类所拥有的政治倾向。

这是政治军事的主从关系决定的。政治决定军事，引领着军事；军事服从政治，服务于政治，二者之间是主从关系。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就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的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工具。培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强化其政治方面的性质特点，便于更好地为军事政治服务，使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是在军事智能化发展中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的具体诠释。

这是不同军队的政治差异决定的。政治的实质是处理阶级之间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的阶级、国家、民族的人分析同一场军事行动，其可行性、必要性和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在同样的军事背景下筹划军事行动的方案思路也是不一样的，主要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各自政治立场对行为原则、方式的

大国军事能力发展的经验启示

□ 吴俊青 释清仁 杨 鹏

强大的军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一块重要力量基石。发展什么样的军事能力，怎样发展军事能力，事关国家崛起进程。近代以来的大国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

军事能力结构是否与外部安全威胁相适应，关系到国家安危

大国实现崛起，首先需要足以抵御外敌入侵、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军事能力。这就需要分析自身地缘环境、作战对手特点、军事发展趋势等，弄清所面临安全威胁状况，据此发展相应结构的军事能力。

近代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深刻教训。从地理环境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国家，但由于长期以来海上威胁较小，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思维传统，强调“塞防”，以发展陆军为主。进入近代以来，英国等海权国家的扩张和崛起，给中国带来现实威胁。然而，晚清政府由于封闭腐朽，对于海上威胁严重失察，海防力量落后匮乏，处于“有海无防”状况，导致了列强自海上频频入侵。

反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把建立强大的国防作为新生政权亟待解决的两件大事之一。通过深入分析国家安全威胁，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与美军面对面交手，毛泽东深切认识到，与以往国内战争时期不同，新中国面临的是拥有高度现代作战能力的强大对手。在此基础上，我军采取了重点发展的原则，以机械化为中心，大力改造陆军部队，扩编增编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重视发展强大的空军，建立近海防御型的海军，并成功地拥有核力量。这就基于敌手、基于安全威胁、立足世情国情军情，构建起真正管用的符合机械化实际的军事能力结构，有效慑止了强敌可能对我的大规模入侵，维护了新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军事能力类型是否与利益拓展状况相适应，影响到国家发展

保障和促进国家发展，是发展军事能力的另一基本要求。这就需要依据本国利益拓展状况，决定是发展本土防御型还是外向拓展型的军事能力。

近代以来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西欧等国纷纷走上上海贸易和运输、殖民掠夺的道路。与这种新的生产发展方式相适应，必须把海军这种扩张性力量作为军事能力发展的重点，对此恩格斯指出：“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年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为了确保海上优势，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抓住海洋主导权不放，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海军经略海洋，借以控制了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海上交通要道，掌握了北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制海权。在按照“两强标准”（即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的数量必须相当于第二和第三海军强国的总和）维持的强大皇家海军的庇护下，英国的市场准入权和海上贸易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进而为国家技术实力的提升和工业基础的稳固创造了必要的财富。这样，近代海洋文明中的三个要素——海军、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促进了英国的崛起，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反之，有些大国违背自身利益拓展状况筹划军事能力建设，阻碍了国家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虽然出现贸易扩张势头，但海外殖民地占有面积较少，海外利益拓展程度不高，需要的是一支本土防御为主、适度外向拓展的军事力量。然而，威廉二世为实现“世界帝国”梦想，宣称“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大肆扩充海上实力，追求全球性军事能力。这就远远超出了德国海外利益拓展的实际需求，未能形成经济

与军事的良性互动，最终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影响了国家正常发展。

能否适时实行战略转变，发展新型军事能力，是大国应对军事新挑战的关键

影响军事能力的各种因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变化之中，例如，军事技术新发展、作战对手新出现、国家利益拓展新变化、国家实力地位新提升等等。只有根据以上因素的变化，适时进行军事能力发展的调整和转变，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军事新挑战，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求。

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在此方面有着一些成功经验。以军事能力结构的转变为例。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吉利和多佛尔海峡把它与欧洲大陆分开，根据这一地缘因素，15世纪下半叶英国都铎王朝正式创立了皇家海军，从此海军成为英国应对外敌入侵的防御屏障。进入20世纪，随着飞机的出现，英吉利海峡不再是阻挡外部入侵的天堑。二战以前，英国逐渐认识到来自德国的空中威胁，决定优先发展空军。1935年空军预算仅为2750万英镑，到1939年已达到2.48亿英镑，超过了海军的经费。正是这一军事能力发展的新转向，使英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大战前几年快速提升，在战争初期顶住了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免遭了灭顶之灾。

再以军事能力类型的转变为例。19世纪末以前，英国主要忙于国内建设与周边拓展，与之相应地发展了以本土防御为主并辐射周边的军事能力。进入海外扩张时期，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的需求，凸显出原有军事能力的不足。罗斯福上台伊始，就说服国会通过海军建设计划，美国军事能力建设开始向辐射全球转变，并于二战后建立起一支全球性军事力量，有效支撑了其全球利益拓展。

塑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

□ 王兆兵 常 胜



影响不同。发展适合我军使命任务需要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需要深入研究我军所肩负的使命任务，以及历史上我军总结的军事政治经验，通过具体的研究设计，使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执行战场侦察、精确制导、辅助决策、情报分析等军事任务时能够从政治高度思考问题，确保未来能够打赢智能化条件下的政治军事仗。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政治属性应有什么内涵

强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对于如何研制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既是一个根本要求，也是一个指导原则。对我军来说，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应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另一个是善打政治仗。既要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好“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综合各种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功能、应用对象、应用环境等因素，所物化到军事应用中的智能需要

蕴含以下政治内涵。

让人工智能具备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设计理念中注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让其以此为基点认识和指导战争。科学理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战争最深厚的根源，以及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对军事的巨大影响，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现实战争中矛盾特点和运动形态，寻找战争规律和解决办法。

让人工智能肩负我军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我军进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规划、设计和研发自然要基于我军肩负的使命任务，作为协助我军履行使命任务的一个物化了的智能工具，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自然应当肩负我军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让人工智能拥有我军优良的政治品质。人工智能最大的特征是具有实

现基于程序和指令的自动化运行。人工智能系统在开启后，只是“无条件”地运行程序和指令，客观上存在“临阵倒戈”的可能。对我军来说，要注重底线思维，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听从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能有丝毫悖逆，所有的行为都要在这个前提下设计运行。同时，研发应用的人工智能还要拥有聚焦实战、求真务实等特质。

让人工智能掌握我军基本的作战思想。通过人类的研究设计和人工智能的学习进化，让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辅助指挥员进行军事行动方案设计时，能够坚持人民战争思想，注重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拓展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渠道、新方式，如网络、特种作战及法律、舆论、金融等领域。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合力，并注重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紧密结合。

怎样塑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治属性

培塑人工智能优良的政治品质，必须从政治高度对人工智能的各种军事应用予以研究考量和筹划推动。在顶层设计环节加强政治思维引领，正视政治因素在军事应用中的影响和作用，科学合理地设计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算法程序，在源头上为军事应用中的人工智能把关定向。

在研判评估时融入政治因素。基于以往的战史样本信息和相关战争规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学习，研究在特定的政治、军事等条件下，军事行动与其军事政治效果之间的相关性规律。除了关注分析武器装

备、物资保障等物质因素外，还要在算法程序中融入军事斗争各方政治制度、战略方针、体制编制、法律法规等长期政治因素，以及精神意志、民心向背、舆论导向等近期政治因素，并分别赋予相应的权重。

在规划方案时突出政治策略。通过算法规划推荐最优军事斗争方案时，参考地图导航系统中的“收费最少”“路程最近”“耗时最短”等策略，在设计军事角度、经济角度等方面策略的同时，还要关注政治策略实现。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家系统技术、神经网络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搭建关系模型，筛选究竟采取什么斗争形式、打击哪些目标、打到什么程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减少伤亡，从而在政治上实现最大效益。

在指挥部署时关注政治参数。政治因素特别是人的思想因素具有主观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只要建立科学精密的标签体系和权重标准，仍然可以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估。要坚持协作攻关，成体系设计，积极构建系统的指标评估体系。在设计 and 运用相关指挥决策辅助系统算法程序时，研究制定基于可互操作性、安全性、系统性、可追溯性等方面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标准，定义可互换的组件、数据和事务模型，嵌入相关政治参数的评估公式，以便辅助指挥员做出决策部署。



豫东战役——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 卢伟

1948年6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争取战场主动权，华野西线兵团在中野和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发动豫东战役，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敌9万余人，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大大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为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同时，该战役的成功实施还坚定了中央军委同国民党军进行主力会战、决战，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决心，间接地促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提前到来，是解放战争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的转折点。豫东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感慨地把解放战争比作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峰，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坚持原则，斗胆直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先后挺进中原，调动国民党军队回防，国共双方各集重兵于中原地区，敌我双方呈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为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中央军委做出了分兵跃进江南、开辟江南战场的战略方针，决定派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下，调动中原敌军南下，打开中原战场局面。但粟裕对此持保留态度，接连发报“斗胆直呈”，认为我军孤军跃进江南，在丧失根据地、丧失群众基础、丢失重型武器装备后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相反，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看似重兵云集，但要守备大中城市，机动兵力不足，尤其是具有野战能力的机动兵力严重不足。而我军虽然总体兵力处于劣势，但是机动作战兵力多，机动能力强，完全可以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调动敌军，集中兵力打几个歼灭战，全面扭转中原局。中央在权衡利弊后，最终同意华野暂缓渡江，在中原地区寻机歼敌。

因势利导，创新战法。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先后打破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汲取教训，以兵团规模集中兵力，而且由于中原战场敌人兵力密集，交通发达，一旦围歼不能迅速达成，敌援军到达，便会陷入消耗战的僵局。在此情况下，粟裕大胆提出了集中更大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想，即：集中一部兵力组成突击集团攻敌之必救，其余兵力组成打援集团阻击增援之敌，力求在全歼被围之敌的同时大量杀伤援敌。粟裕认为，我军通过多次攻打

中小城市和机动歼敌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攻坚战、运动战和平原阻击战经验，持续作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老解放区和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下，已经初步具备了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能力。

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豫东战役中，粟裕多次使用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法，通过分阶段的连续作战歼敌于运动之中。豫东战役前，中共中央的既定目标是歼灭邱清泉的第五兵团，但由于敌军过于密集，在原有作战方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粟裕立即将目标转为开封，出敌不意攻占开封。战役第二阶段，粟裕又利用敌人急于夺回开封的心理，主动诱使邱清泉兵团占领开封，并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围困区寿年兵团于睢杞地区。战役第三阶段，黄百韬兵团抵达战场后，粟裕又果断改变全歼区寿年兵团的部署，改为围歼黄百韬兵团。最后，粟裕又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和敌我兵力对比放弃全歼企图，及时撤离战场。在战役各个阶段，粟裕始终坚持以机动优势调动敌军于运动之中，同时坚持以一部兵力攻敌，其余兵力打援的战法，攻守之际转换灵活、不拘一格，充分展现了其机动灵活、坚决果敢、敢于险中求胜的用兵特点。整场战役看似眼花缭乱，实则有迹可循，正是淮海战役“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预演。

以点破面，打破僵局。华野在中原战场的攻势作战，不仅提前完成了既定作战任务，而且调动了胡蝶、邱清泉、黄百韬等兵团驰援豫东战场，华野西线兵团仅用6个纵队就吸引了国民党军中原地区几乎全部的机动作战力量，造成了中原战场两翼的空虚。几乎在豫东战役的同时，山东兵团在东翼发动兖州战役，中原野战军在西翼发动襄樊战役，几乎兵不血刃拿下兖州和襄樊，歼敌6万余人，自身伤亡不到2000人，至此我军牢牢把握了主动权。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虽然在表面上依然占据开封、济南等省会城市，占有徐州、郑州、青岛、威海等重要城市，但实际上中原地区机动作战力量或被歼灭、或受重创、或被分割，几乎丧失了战场进攻能力，以至于在几个月后的济南战役中，华野的18万阻援大军一枪未发，徐州“剿总”坐视济南丢失。

三军齐气，影响深远。豫东战役的成功实施雄辩地证明了我军有能力在敌重兵云集的中原地区攻坚大中城

